

「未來歷史學：當代典藏 與數位世界論壇」觀察紀錄*

曾婉琳、葉萱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史博）於 2016 年典藏了由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移交的 7000 多件「318 公民運動」物件；同年的年初發生「206 地震」，重創臺南，臺史博第一時間即前往維冠大樓倒塌現場了解狀況，並於現場救援工作告一段落，亦進行災民物件採集；另，2016 年臺南的中國城拆除前，臺史博已先採集數十箱物件，包括文夏音樂城和戲院物件等等。這些行動，臺史博以「當代典藏」稱之，然而臺史博的「當代典藏」行動其實早在 1999 年 921 地震之時，就有接收來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在竹山敦本堂、東勢善教堂等災區所採集的物件。

臺史博面對「當代典藏」，仍在摸索各種可能性，包括理論的援用、對於傳統歷史學的再思考、跨領域的合作等等。因此，於 2016 年亦開始不定期舉辦「當代典藏」相關議題論壇，2016 年的「為明日收藏：318 公民運動與當代典藏」論壇以及 2018 年的「未來歷史學：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論壇」。

本文為 2018 年 5 月「未來歷史學：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論壇」的觀察紀錄，已事隔 1 年多。回首這一年來，臺史博在上述行動的基礎上，完成了「迫力·破力：戰後臺灣社會運動特展」，中國城的物件整理及舉辦相關座談，並於 921 地震 20 週年前夕，讓善教堂的物件回鄉展示。

* 本文感謝朱英韶小姐協助文字整理。

** 曾婉琳，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葉萱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科技計畫助理

一、未來歷史學¹

臺史博副館長謝仕淵² 在主持開幕時，提到林富士老師說的未來歷史學，即是博物館的當下，特別是對當代歷史博物館而言，博物館一方面進入一個促進博物館溝通功能的期待，另一方面在面對歷史研究，關於寫作和對話的概念，也不斷被提出。當這兩個相加之後，在博物館的實務和歷史研究上，兩者新的潮流匯聚在一起會是什麼？臺史博過去幾年，不論是在展覽的策展或是藏品的詮釋，都盡可能讓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參與者一起進到博物館來，一起完成大家看到的展覽。而這個機制，逐漸成為博物館的日常，也是不斷要去思考、精進的課題，與研究學者、博物館工作者等等持續討論，期待能激發更多想法，正如我們集聚在這個論壇。

回到這場論壇的主題「數位世界」與「當代典藏」。為什麼把「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兩者相互結合？當博物館希望透過收藏行動與當代社會互動時，博物館既有的人力與物力可能無法對所有的當代事件都進行紀錄，此時，或許可以透過「數位世界」的新技術，分析出當代社會發展中的重要議題，再進行歸納、收整。這正是此次工作坊將「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結合的用意。

在「數位世界」裡，「新」的歷史分析、課題和寫作不斷被關注，例如在這場論壇中祝平次老師所提出的標記工具，便是讓歷史知識跟歷史資源被運用、重組，達到多個目的一種工具。在這個概念之下，我們將會看到「數位世界」的歷史資料分析和今日的方法已經很不一樣。而面對「當代典藏」，就臺史博的收藏經驗來看，博物館不僅在收藏過去的、已經發生的，更是透過收藏

¹ 此次論壇的題目援引自林富士老師寫的一篇文章〈未來歷史學〉：<https://www.most.gov.tw/most/attachments/7bd57fld-8b19-4eb2-8239-ea292ed8f3c1>（2019.10.5 瀏覽）

² 謝仕淵目前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的過程發展出清楚的策略，亦開始思考如何面對當代社會？應該進行什麼樣的收藏？這其實也是博物館跟當代社會互動的一種可能。

二、老狗與新把戲：一個中年臺灣史學者的 DH 之旅

這場邀請張隆志老師進行專題演講，題目是「老狗與新把戲：一個中年臺灣史學者的 DH 之旅」。張老師是數位世界的使用者、觀察者，同時也是數位人文工作中「後進」的實際參與者。他以多重角色的身分，分享在臺灣史研究過程中，關於數位人文、數位典藏的經驗。

張老師聊到其在臺灣史領域研究已逾 30 年，碩士期間從事臺灣平埔族的研究，博士論文則與 19 世紀臺灣番地有關。在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後，張老師進到中央研究院服務，至今也大概 25 年了。這期間接觸到不同的議題，例如日治初期有關殖民知識建構的問題，或是當代臺灣史學史與公共歷史記憶的討論，這些都帶領著他深入臺灣史，認識這個島嶼，也開啟與這個社會、人群互動的一扇窗。在研究過程中，藉由許多老師跟朋友的協助，累積了各種經驗，期許自己能夠運用各式各樣的資源跟工具，生產出符合時代與社會需要，而且真正留下讓讀者覺得有用、有趣、有意義的歷史學知識。與 30 年前相較，張老師深感現在臺灣史的讀者選擇眾多，舉凡通史、圖解、地圖，各種不同角度、類型且印刷精美的作品都有。

與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的邂逅，張老師從 C. P. Snow 的《兩種文化》（The Two Cultures）談起。張老師談到所謂的科技、數位人文或人文資訊學，我們實際面對的就是兩種不同的學科領域、術語、論述，因此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地跨界？如何有效地進行溝通對話合作？如何在出現問題的時候，能夠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跟不同學科專長的人來共同解決一些問題？」所以，要熟悉圖書館，了解資訊、資料庫的架構、後設資料欄位，也透過各種關係去認識其它的工具、程式。在這個過程當中，也試著與原來歷史學

的那套方法「嫁接」，或重新融合。猶如 C. P. Snow《兩種文化》，這本書被很多人用來做對話的起點，如何跨越所謂人文跟科技之間的鴻溝跟壁壘，然後進行有效研究。從博物館歷史學的角度來講，有趣的挑戰在於這不只是跨界的對話，如何共作、協作才是最大考驗。張老師笑稱自己是臺史博的鐵粉，原因在於臺史博除了努力搜集各種文物資料之外，亦透過展示來回應社會議題，甚至在新的取向或是一些未來的趨勢都有一定的敏感度。

張老師回憶起 30 年前碩士論文仍是手寫時，請當時新成立的「無花果」打字行幫忙打字，與現在的「數位」時代相比，那時還是「手工業」時代。當時擁擠匆忙的臺北車站、街頭，沒有人低頭滑手機，但在 20 年之內，科技已不知不覺的滲透了我們的生活，用 Google 搜尋、用 Amazon 買書、用 Facebook 連結社會、用 Youtube 欣賞影音。對於新的世代來講，這已經是他們的日常。張老師自嘲道時代的轉變這麼大，於是他以英文俗諺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學不了新把戲)” 發想，將題目訂為「老狗與新把戲」。但是我們要問老狗需要學新把戲嗎？還是讓更強壯、更新的狗早點接班，來玩他們的把戲就好？還是，老狗可以玩新把戲，因為什麼是「老」？又什麼是「新把戲」呢？我們今天熟悉的一些歷史學概念、工具，可能在 30 年前也是新的東西，就如所謂新文化史在 1990 年代仍然新潮，但今天大家已經耳熟能詳。

張老師從使用者的角度切入，他認為在 2002 年到 2015 年這十幾年間，國家使用了許多資源，動用了各式各樣的人力、技術，完成大批的數位典藏。從公眾史學的角度來講，這些成果已經是臺灣今天公眾歷史學重要的基礎、新的資源，然而，這些成果有沒有有效地轉譯成公眾歷史學，或公眾可以使用的資源？這仍是很需要討論的課題。張老師認為我們其實處在一個「後數位典藏時期」，這時期的臺灣歷史研究與博物館典藏朝著數位人文方向前進、接軌，國家帶頭建立數位人文中心更加強了這個趨勢。除了以使用者的角度分析，張老師自認是一位好奇的觀察者，他見證參與了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從籌備處以來的數位化工作。以「臺灣文獻叢刊」、「日記知識庫」為例，張老師說明從史

籍自動化、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研究，這些不同階段的成果也促使更多臺灣史研究者一同使用數位資料庫，透過這些資料庫查找史料已是這些研究者們的基本功。

作為一個實際參與者而言，張老師談到兩個部分。其一是他參與的兩場會議，2017年在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臺灣人物傳記資料庫的工作坊，以及2018年4月底史丹佛大學的Digital Humanities Asia（簡稱DHA）的會議，兩者會議都提到近年中國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庫《中國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 Base，簡稱CBDB）³。在臺文館舉辦的那場工作坊中，聚集了歷史學、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共同討論如何在檢索之外，運用資料庫進行更深度的研究。而史丹佛大學的DHA會議，與會者不乏是這領域長年的研究者或是觀察者，也有博物館、圖書館等不同領域的專家，討論的內容包括透過資料庫研究的新發現，或是如何跨領域問出新問題。因為數位計畫通常要投注相當多的經費、人力，如何更有效的分工，或如何開發更有趣的工具，都是討論的重點。這兩場會議都展現出從數位典藏層次到數位人文研究的重大跨越。其二是張老師實際置身在數位人文研究領域中參與研究計畫，他舉了與一位捷克科學院的教授合作的案例，以作為臺灣史研究者的角色，輔助對方取得適當的資料庫、提供背景分析，以及臺灣史學界的詮釋角度等等，而在過程中，張老師也觀察到數位領域的研究者，在運用工具進行研究時，他們是怎樣設計問題？如何執行問題？數位人文學在臺灣的確是一個新興領域，在蔣竹山老師、黃寬重老師以及呂妙芬老師的〈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十個熱門及前瞻議題〉⁴文章中，也提到數位的課題。

³ 《中國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 Base，簡稱CBDB）是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跟他的學生慢慢建立起來的，並且跟中研院、復旦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合作，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案例，透過許多數位人文的研究，包括社會網絡分析、歷史地理資訊系統、語調語詞等，某種程度都是CBDB這個團隊以及其他相關的一些研究所，所開啟或是正在發展的工具。

⁴ 蔣竹山、呂妙芬、黃寬重著，〈當代歷史學新趨勢：十個熱門及前瞻議題〉，《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8:1，2016。

最後，我們到底要如何面對「數位人文」？張老師以兩個不同立場的學者作結。第一位是林富士先生，他的〈未來歷史學〉文章用比較正向、肯定的樂觀態度，宣稱歷史學因為數位化的影響，不論是史料、工具、方法到問題概念的設定，都在經歷很大的轉變。不只臺灣，全球的歷史學正在進行或經歷典範的轉移，歷史學家或是有興趣從事歷史的人，應該要正面地去面對這樣的趨勢，然後積極主動地去瞭解、運用這些工具，並投身到這樣新的潮流當中，進行知識的生產跟實踐。

但是，作為臺灣數位人文重要提倡者之一的清華大學祝平次老師有些更切身的觀察，他以第一線數位人文工作者的角度書寫〈數位工具與文史研究〉⁵這篇文章，他在文末提到：「臺灣發展大型數位人文計畫的情況，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學術單位外」，例如中研院、臺灣大學，「可以說是不樂觀的」。整體而言，他認為「就臺灣人文學科目前資源的建置而言，並不利於數位人文的發展」。這不一定是消極，但比較務實，是以個人、小團體、微觀的角度出發，而不是以大計劃、大機構的運作來主張。但祝老師仍認為數位人文「作為一種非常有潛力的研究方法，是與國際學界進行交流的重要管道」。他在提倡數位人文這麼多年，歷盡各種甘苦滄桑後，「還是期待有個別學者能夠投入，慢慢累積以改變現狀」。

張老師最後回到對於「老狗與新把戲」這個命題，他認為老狗當然要把自己的老把戲玩好，不需要太介意是不是能夠玩新把戲，但是如果他有足夠的興趣跟資源去學習新把戲，甚至結合新舊、進行創新，深化既有研究成果，幫助新生代的研究者開啟新的研究可能，那老狗要面對的可能就不只是要不要學新把戲而已了。做為一個教育者，他可能必須了解這個新把戲是什麼。另外，若從學術世代交接與分工的角度切入，張老師覺得每個世代都有新的課題跟挑戰。可能老狗已經某種程度，成功地或失敗地，或甚至興奮地或沮喪地面對過他的課題跟挑戰，本身也進入到史學史的一個部分。但是新的這些研究者，如

⁵ 祝平次，〈數位工具與文史研究〉，2018年1月26日發表於網路部落格《歷史學柑仔店》。

何去體認到新時代的挑戰跟課題，並且能夠運用到最有效的研究方法跟工具，提出關鍵的課題，並且有效地落實他的研究。然後透過博物館、公眾歷史學或其他的管道，將這樣一個新的知識，轉譯成大眾的公共財，轉譯成大家再重新認識臺灣的人群與社會的新資源，或是讓大家可以繼續往前的一些動力，張老師覺得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共同思考的課題。

三、誰在虛擬世界中

張隆志老師在專題演講中，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觀察網路讓日常生活、歷史學者的研究方法起了什麼變化。但當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網路的本質時，或許正如電影 *The Matrix*（臺灣譯為：駭客任務）的隱喻一樣，我們被網路所密接的現實生活或許才是虛擬的，誰能看到虛擬世界背後的真實？這場名為「誰在虛擬世界中」的討論，即邀請痞客邦執行長陳正然先生來分享〈網路與婉君們：從蕃薯藤到痞客邦〉，講述越來越真實的網路世界，從 1980 年代以來其社會性質的變化，另外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莊庭瑞副研究員團隊以〈資訊服務平臺的內容保存：以協作文件為例〉分享該團隊如何讓虛擬世界中的共筆協作，變成日後的真實史料。

陳正然先生雖是社會學出身，卻是臺灣第一個搜尋網站「蕃薯藤」的創辦人。他談到從創辦「無花果打字行」、「蕃薯藤」到現在的「痞客邦」，不同時期的網路本質及社會性質是在轉變的。網路與現實世界越來越密接，甚至結合成了一個虛實共存的生活世界。陳先生一直思考著數位科技、網路有沒有機會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的活動或歷史，例如他在 1980 年代時，特別想了解臺灣史，但當時的社會氛圍（戒嚴時期）並不允許他這樣做，所以他進行本土研究時，幾乎沒有第一手史料可用。因此，當他接觸數位化、網路社群後，便希望資訊科技可以做為資料整理的方法，讓更多人能夠翻找史料。1980 年代末期，陳先生前往美國留學，並看到圖書館系統可以做為資料

互通的機制，史料數位化後更能廣泛流通，於是開始留意資料系統。特別是1993年，Mosaic瀏覽器的出現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它可以圖文並茂地在網路上呈現資料。於是，1994年底陳正然先生和其團隊推出了第1版的「蕃薯藤」，它是個index，約集中了十幾個社會運動及弱勢團隊的網頁，讓大家可以快速的了解臺灣勞工、婦女、人權、原住民等各方面資訊。

到了2000年後，大家已漸漸熟悉網路使用方法，使用者除了觀看別人的資訊，也開始希望自己能有發表意見的空間，於是有了部落客（blog）。而這就像是言論市集，此時這些網路經營者就得思考如何提供更便利的平臺服務，讓搜尋者能夠容易的找到這些部落客平臺。而這樣的網路演進已與「蕃薯藤」時期有很大的不同，陳先生引用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孔祥重先生對於網路的想法，以3個面向來談這些年的網路演進。

其一，網路的發展從單一的機器到系統的串聯，例如：IBM、HP等。人們與這些網路技術磨合、熟悉，至今網路無所不在。正如前Google總裁Eric Schmidt所說「網路會消失（Internet will disappear）」，因為「網路」如同呼吸一樣自然，再也不會有人特別將它提出來談論。而我們的生活中充滿數位化工具，生活也密接在這樣的虛實中。就像在開車時，機器回報前有測速照相，我們甚至不會懷疑機器的回報是否有誤，虛實結合已成必然。其二，網路的發展帶來時空壓縮。現在與虛擬結合的空間已不是物理空間，不管是興趣、網購等資訊分享，特定的網路空間是可以把全世界的人聚集在同一地方的。原本社群（community）會受到物理鄰近性的限制，然而現在透過最基本的數位空間與數位時間就能自成一個生態系（ecosystem）。其三，網路的特性就是每天產生大量的資料，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曾統計，人類90%的資料跟資訊是在過去兩年產生的，這些內容大多並非專業技術，而是日常生活經驗。在過去，學者要研究歷史，因為材料的限制，大多先從有紀錄的王侯將相入手，但在數位時代，網路記錄下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資訊，過往許多可能認為是眾口鑠金的事，在今日透過網路演算，或許都能證實。

因此，在這個虛實的世界中，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人類的紀錄，到底是誰的歷史？誰能書寫？某段歷史與我們有沒有關係？怎麼讓這些新史料講話？陳正然先生認為，大數據給歷史學帶來很好的激勵，但其實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它挑戰了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價值觀。網路不只改變科技，也帶來新的生活方式，而這樣的新生活方式，也應該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對象。

同場的莊庭瑞老師團隊分享如何透過實驗復原 318 公民運動時的網路協作文件。莊庭瑞老師提到網路世界的即時，讓資訊取得更為便利，也讓我們產生錯覺，以為資料會一直在，但這些內容若遇到網路改版或經營者異動，通常很難全貌保存，甚至可能會消失。由於現在諸多線上的資訊服務免付費，若細讀其使用條款，會發現平臺的經營者並不擔保其服務的項目與品質不變。協作平臺上的內容保存與呈現，全權決定在平臺的經營者，而非協作者。若需要轉移平臺，協作者是否可以順利遷移資料？協作資源在格式、內容、脈絡上能否無失真地移植與重現？著作權利、個人資料等相關法律議題是否能解決？於是莊老師帶領其團隊做了實驗，嘗試復原 318 公民運動時所用的其中一個協作平臺——Hackpad.com⁶。

接著由莊庭瑞老師團隊中的王家薰小姐進行報告，她提到資訊平臺上協作文件的保存議題分為四個面向，包括內容資料、編著工具、執行系統與依存環境。內容資料是關於內容文本的資訊擷取；編著工具是指文件一定有相對應的編輯軟體；執行系統是作業系統以及運算存儲設備等；依存環境則如軟體系統的維修能力、程式執行時所依附的網路環境，以及保存機構的永續性等。

在執行作法上，開放、自由、參與為基礎是確保數位內容得以長久保存的關鍵。從上述的四個面向來看，內容資料採用「創用 CC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CC BY-SA），編著工具使用開放源碼，作業系統與硬體設備也非獨家業者供應，如此這樣的保存狀態在未來就有尋求替代的方案。最後，數位內

⁶ Hackpad.com 目前已被 Dropbox 公司收購，部份當初 318 公民運動時的共筆脈絡已消失。

容的依存環境複雜，擁有廣大的參與群體是發展永續保存的基礎策略。就目前協作平臺而言，非營利組織的維基百科是其中的典範。

關於 318 公民運動，每個人對這個運動都有一些各自的觀點，透過這個實驗，莊老師團隊希望記錄下過程。並且以考古的態度，將這些資料完整保存，或許在未來若有研究者想要以當代歷史事件作為研究對象，就能有較完整的資料作為比對、分析，未來也希望這些資料能以離線安裝的方式呈現。然而，很多資訊已經喪失，所以這個工作目前是嘗試，不完整也還沒有結束。

如王小姐提到的，這次的試作比較像是實驗，可以讓公眾瞭解目前資料的復原程度距離數位保存的理想還有多遠。保存（*preserve*）貴於能夠再現（*represent*），物質文物的再現涉及解釋、功能、與情境。在採集和保存的過程，需要專業領域以及在地知識的支持；數位內容的保存與再現，除了領域知識以及使用社群之外，還需要執行環境的支撐。而執行環境同時又有物質（硬體）以及數位（軟體）兩部份。數位內容的再現議題也就依此層層相扣，相對複雜。而數位保存與再現可分為幾個境界，分別是內容脈絡（*content and context*）、外觀介面（*look-and-feel*）、功能營運（*function and operation*）以及工藝技術（*skill and technique*）。內容脈絡著重於資料文本與其生產脈絡的保存，期望能夠重現，但未必能夠忠實地呈現原本的外觀介面；外觀介面為內容呈現時的感知與操作方式；功能營運是追求數位物件的效用表現及情境存續，但是不拘泥於原有的技法；工藝技術則是以數位物件產製當時的技術方法，重現其內容、外觀與功用。

面對數位內容保存與重現的工作，典藏與記憶機構將不可避免需要數位工藝的技能，工作初期或許可由技術社群協助，對選取的數位物件進行有意義的保存，但後續關於數位技能的傳承、數位史感的培養，不可避免的將成為典藏機構實務工作中的重要能力。因此，資訊相關領域的知識養成與資源投注也就日益重要。

最後，這場次的交流上，陳正然先生提出了近年後被關切的議題——「遺忘權」的重要性，資訊的保存與遺忘權是值得大家再去觀察的。

四、數位世界的全民書寫

上一場所談論的「虛擬世界」讓我們看見短短 30 年來的快速變化，網路已成為我們的日常。而為了記錄當代事件，網路上的共筆協作文件是重要事件的史料，它不僅保存文字內容，更應將當時的數位軟、硬體一併保存。

但在這個全民書寫的時候，歷史學不可取代的優勢與特色是什麼？陳恒安老師帶大家一起思考〈如何看待數位世界的全民書寫〉；蔣竹山老師則透過英國民間社群「金屬探測」、「歷史裝扮」及「歷史遊戲」，讓我們看到〈當歷史成為商品：公眾如何感知歷史〉，民眾透過各式感官與媒材了解歷史，相較於現在臺灣的歷史學系教習方式，似乎與這些多元的史學應用方式還有一段距離。

陳恒安老師從 1980 年代以來歷史學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談起。首先，他指出我們現在教育方式與接觸資料的方式已異於過去。就如法國哲學家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2012 年出版的《姆指姑娘》所寫，以前的知識都在腦袋裡，現在則是透過姆指查詢像 Google 這樣的蒐尋網站，資訊隨手可得。其二是世代交替，陳老師以二戰後的德國為例，在倖存者與受害者紛紛離世之後，到底大家要如何記住大屠殺這件事。另外也提及後現代理論對歷史學的衝擊，1931 年卡爾貝克（Carl Becker）所寫的〈每個人都是自己的史家〉講述每個人都有機會撰寫、建立知識的民主，文章の後半部則談論史家的角色。雖然卡爾貝克認同每個人都有機會去為自己的需求尋找不同的議題並書寫，但大家也應培養如史家般的能力，例如學會判別資料等。

接著陳恒安老師談及「記憶文化」與「歷史文化」。「記憶文化」較之歷史學更加生動，然而我們選擇記住某些事，可能同時也遺忘其它事，甚至有些記住是刻意的，例如透過教科書。「記憶文化」與當代也非常相關，例如我們最近在談轉型正義，正是因為當代的我們注意到那些被噤聲的事，於是去發掘

被遺忘的過去，但有人批評在記憶的過程中，反而放棄了現在，例如談及二戰的殘忍，好像不公義這件事只存在於過去，卻忘了反思這些事情在當代可能仍同時持續複製著。

而歷史學或「歷史文化」是強調學科性或科學性，它是一套歷代傳承的知識，歷史是思考線性的時間問題，這整個時間當中，如果取其兩端，是在了解它的差異，兩端中間為變遷，變遷若有很大的變化稱為轉捩點，轉捩點若很激烈則稱為革命。所以現在歷史學思考的分類或是範疇，其實就是在這個時間線上的論點。時間線上要思考什麼？就是認同、政治意識、權力階級或經濟問題。最後由倫理判斷這些事情的對錯。以上所述的種種就是一個歷史文化，我們透過歷史學的判準，論述過往的事情。

然而，不論「記憶文化」或是「歷史文化」都是對過去的研究與探索。有鑑於當代越趨快速的轉變、消失，全世界興起了保存的熱潮，數位典藏往往是第一步，而其重要是因為有人去使用，進而賦予意義。但如何在眾聲喧嘩、自治民主的時代，去談意義？又是誰的意義？陳老師以美國一個博物館的展示詮釋為提問，當該博物館展示二戰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戰機 *Enola Gay* 時，應該強調國家的榮耀，還是核武的恐怖？又例如當成功大學要整修成功湖時，應該改造成哪個世代的記憶？

今日，歷史面對的是「全民書寫」的時代，陳老師覺得這既是一個大挑戰，但也是一個以不同思考方式共同討論的契機，不過，他仍強調歷史學的基本功。他引用杜正勝老師講過的一段話——如果新的歷史學還有發展的話，可能不是新的方法，反而是歷史學者心態的解放。面對新的媒材，如何應用數位典藏或 VR 展示歷史研究，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接觸、挑戰的。

蔣竹山老師以英國案例來看歷史的全民書寫，他認為在數位時代，歷史學遇到的不只是史料的問題，也涉及不同的方法。他以自己的教學現場為例，透過「大眾史學導論」的課程教導歷史學現在的變化，這堂課不只討論學術內在發展，也提及數位時代的歷史，甚至當歷史成為商品。英國對「歷史如何被消費」這件事有許多研究，例如 De Groot 的書闡述了歷史怎麼被理解、販售。

由於這世代有各式各樣的影視平臺，這些科技怎麼影響大眾對歷史的認識、感知和理解？社會如何消費歷史？對於爭議性的議題，怎麼透過公眾史學角度去重新認識？

在英國歷史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虛擬的轉向，或說視覺的轉向。然而我們必須了解民眾接觸的過程中，並不見得是被動的，參與者其實也創造了自己的敘事方法，甚至反映他們的歷史經驗。英國相關的公眾史學研究很多，例如 Simon Schama 的《猶太人的歷史》或 Tristram Hunt 的《帝國城市》，這兩位學者除了進行學術研究，也有不少跨領域行動。Simon Schama 除了是藝術史學家，也參與紀錄片製作；Tristram Hunt 曾經從政、當過主持人，因此對公眾史學有不少特殊觀察。然而在臺灣，歷史類型的書籍除了學術論文外，其他多是趣味或歷史普及類型。

英國的大眾參與歷史，正如上一場提到的日常生活大數據，英國地方民眾就是透過這些資料大量出版地方史，還有熱門的「金屬探測」社群透過專業器材、知識，在鄉間從事歷史類型的尋寶活動，英國政府也透過法令規範這些民間考古出土的物件，這些東西除了可以放上網介紹、考證外，也能促成古物收藏、歷史裝扮、歷史遊戲的發展。另外，像 BBC 就透過網路收集歷史聲音、圖像等，也曾發起「人民的戰爭」計畫，收集各種二戰的資訊。

於是，我們看到大眾理解歷史，涉及媒體、圖像、物件、聽覺、視覺，與博物館有關，甚至民眾親身的參與，這跟過去學院史學強調文字資料的歷史學已經不太一樣，更像是一種「感官歷史學」。蔣老師認為感官歷史學強調的是歷史的生產與接收方式，跟所謂傳統史學方法相較，不只是一個新史料，也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最後，蔣老師提及應從四種部分重新認識新媒材，一是即時性的資料，二是移情與同理心，三是道德論辯，最後是能以詩意的角度去理解這些由新媒體創造出的資料。

五、數位世界與人文研究

該場次由廖汝銘老師分享〈數位時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祝平次老師〈標記史料的應用實例〉，談及數位時代人文社會學科研究方法的改變，以及數位時代才衍伸出的研究方法。

在演講一開始，廖汝銘老師便借用了一位日本學者把數位人文比喻成「黑船」說起。在日本歷史中，洋人的黑船迫使日本開放通商口岸，但也因此有了之後的明治維新。今日我們面對這艘數位人文的黑船，到底是該對抗還是接受？

數位世界的到來改變了歷史與資訊研究的基本範式，網路尤其影響甚鉅。許多人透過網路組成社群、建立發言權，同時也為學術帶來新風潮。而在學術圈內，也形成數位學術（digital scholarship），例如現在做報告、分析，一定是用 excel、word，很少用紙本，我們已經在數位化環境中從事學術工作。在這其中，雲端是一個重要的觀念。雲就是無所不在的計算、儲存資源，端就是手機、電腦，而這些機具透過網路連結。過去，我們可能會將工作檔案存取在電腦中操作，但現在在雲端上檢視資料反而比在電腦上操作更快，例如：Google Map 載下來可能要 200G，電腦可能打不開，但透過 Google 雲端，便可以隨時順暢的縮放。雲端服務確實改變了許多資訊產業的生態，百視達倒了，實體音樂 CD 也在慢慢消失。今日，圖書館、博物館也在這個資訊載體變動的浪頭上，確實，這艘威脅的「黑船」已經到了門口。但這黑船也帶來了新的機會，讓許多過去無法享受這些知識資源的弱勢者，透過網路便能公平的取得這些資源。

廖汝銘老師小結了這艘「黑船」的厲害之處。其一，它可容納大量的數位化資料，但相對地數位化成本很高，傾一國之力都難為，目前是跨國企業才做得到。其二，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已是生活必需品，之前是由學術機構、出版社、博物館等提供資訊，現在人人都可以在網路建構知識，也造就了不少

網紅。其三，挑戰學術殿堂的寫作品味，從期刊書寫轉變成符合大眾閱讀習慣的文章。其四，傳統人文學科很多是單兵作戰，而且倚賴物質世界，以致各做各的，然而網路環境促成了跨域合作的可能。因此黑船不盡然是在挑戰傳統領域，它可能夾帶著船堅砲利，成為個人或機構中研究時的長處。

於是，我們回頭思考圖書館、博物館能做什麼？除了基本的功能，目前都致力於將藏品數位化，但這種原生的數位檔資訊，是很零碎的，研究人員有沒有能力去歸納、發現意義，才是重點。也就是說，研究人員很有可能沒有能力去用這些數位資料，然而會操作數位分析工具但不懂臺灣史的外國人，可能做出比研究人員更好的結果。

數位分析工具很多，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它可以將複雜的人際網絡關係視覺化，GIS 則是可以把一件事運用地圖建構起來，所呈現的不一定是歷史，也可能是當代，讓我們得以看到龐雜數據背後的隱諱內容，而它可能是文本關係、社會關係，也可能是空間關係。就歷史而言，我們多以線性觀點看待問題，但是有了這些數位工具，便可以從空間、電腦計算的角度設想問題，如此我們對史料便有了更多元的視野與想像。這也是數位世界的優點，資訊的拆解組合非常容易，所以我們可以重組這些資訊，進而看到很多過去難以發現的關係。

所以未來的圖書館、博物館可能面對的問題，其一，如何取決何時該使用人工智慧。圖書館、博物館絕對不是提供研究材料而已，應該是提供一個擁有數位工具的環境，讓大家可以到館內或利用雲端，有效取得想要的資料。然而，以目前的人力、資源，是很難將所有藏品數位化，或是將數位化資料整理成方便使用的狀態。這時可考慮集眾智慧資源行動（crowdsourcing）方式，運用數位平臺，讓有興趣的人來協力整理數位資料、寫詮釋、甚至數位策展。其二，走出博物館、走向群眾。若都已數位化，觀眾不來博物館時，我們可以將已數位化的研究材料帶出機構，走向田野與地方，讓博物館藏品與地方文史互相交流。另外，數位環境也可以讓閉館中的博物館，繼續服務群眾。如此一來，博物館的經營與社群管理將與傳統的思維有所不同。

接著祝平次老師分享的是數位時代的文本分析工具——標記。其實我們天天使用的網頁就是一種使用標記語言，如果我們在開啟的網頁上按下「F12」，就可以看到網頁資料的原貌。然而「標記」的概念自古以來即有，例如中國古書，利用位置關係將段落顯現出來，這種文章結構是一種標記，或是小學的標點符號也是典型的標記。因此，祝老師認為對於人文學的討論，不是張隆志老師提到的新把戲或舊把戲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願不願意把戲打好。在數位人文這部份，要先教會電腦人想要做的事，才能期望電腦做到你想做卻做不到的事，但這些事該怎麼進行？以前的學者可能都想過，只是沒有可行的工具。

所以，標記就是大家看到的網頁的真面目。但為何要用「標記」呢？我們看到網頁時，功能的調配是非常彈性的，然而，網頁上並不是想要寫什麼就能放什麼。如同博物館的藏品在收進博物館時，物件的描述也需要規範，才能進入資料庫。然而，數位化改變了生態，其中改變最大的便是全球化，它帶來很多災難，卻也帶來了好處。以圖書館與博物館為例，全球化與數位化使這些機構有了共通標準，研究人員可以用這些標準描述物件，因此就算在不同的機構，一旦利用共通標準建立資料庫，內容就可以互相流用。透過不同資料庫的串連，研究的對象或議題得以延伸出不同樣貌。而這些技術，其實就是傳統歷史學家的看家本領，與現在數位時代不同的是，這些運作都是在傳統歷史學家腦子裡，因此，也不見得有所謂新舊觀念衝突的問題。

其次是資料型態的變化，之前廖老師提到從文字變數字，數字變圖表，再變成圖像、地圖。祝老師談的是文本分析，全文用標記，也保留全文，但我們可以加入對它的描述，透過加入這些標記，我們可以做更多的研究，例如分類索引，或是進行人際關係網絡的分析。

祝老師以荷蘭萊登大學學者魏希德（Hilde De Weerd）為例，她標記宋代王明清的筆記小說《揮塵錄》，只標註了 6 個項目：作者、收藏家、與談人、發言者、皇帝、著作，就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但雖然僅標記了 6 個簡單的項目，卻可做出很多富涵資訊的圖表，例如誰提供王明清資料，其頻率高低等。

而當將每個人名再與其它資料庫串連時，例如將人名連到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就可以得到更多資訊。這就是單純文本和已標記後的文本之中極大的差異。

之後，魏希德發展出半自動標記平臺（MARKUS），可以運用這平臺，將文本放入，它會依據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自動幫忙標記時間、地名、人名、官名等。於是，我們看到了方法學上意義的轉換，可以探測許多可能性，這類標記計畫完成後，就可將標記的資料和分析結果放在網路上，大家可以去閱讀、檢驗，它就變成很特別的閱讀平臺。

六、「歷史」博物館的「當代」典藏

最後一場次的主題拉回當臺史博面對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時，博物館該有什麼樣的思維跟做法？臺史博典藏組葉前錦助理研究員以〈當代典藏的保存維護挑戰〉為題，分享中央研究院將 318 公民運動物件移轉至臺史博的過程。這批多元複合材質的文物，與過去博物館處理的物件有很大的不同，在保存跟整理方面，典藏組面臨了不少新的挑戰。另一位分享人是研究組的曾婉琳研究助理，題目是〈活在當下的歷史博物館：觀看並省思 VR 再現歷史的『虛擬』跟『實境』〉，談的是在數位世界中，博物館要用什麼樣新的科技手法或數位形式，與觀眾互動、接觸，甚至發展新的展示與教育推廣。

葉前錦從博物館的蒐藏歷史談起，博物館是隨著時代精神與時俱進，改變其蒐藏概念，以前可能會認為博物館應該要蒐藏反映與記錄過去的社會文化歷史、生活的物件，但漸漸地也思考著，應該要蒐藏一些當代社會文化的物件，並進行記錄。特別是歷史類博物館，假設只有蒐藏古代物件的話，可能讓人覺得好像有些斷層，跟現代沒有連結。如今，我們面對的當代社會越趨多元，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歷史記憶、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甚至不同科技文明也有了不同的展現等，有些是新舊交融，有一些會變遷或重組。這促使

博物館也應該轉變成一個為當代歷史負責的角色，變成積極主動的引導者，除了帶領大眾了解過去的歷史，也要跟觀眾一起創造新的公共歷史。

之後，葉前錦以 318 公民運動物件為例，談到臺史博遇到的挑戰。這批移轉的物件約 7,266 件，除了實體物件外，也要將中研院已建置完的「318 公民運動文物記錄典藏庫」與本館的文典系統比對、將資料匯入。318 公民運動物件類型很多，例如公文、照片、立牌、標語、海報、布條、圖繪、裝置藝術、服飾、活動用品等，也有來自各界的鼓勵的明信片、書信、卡片、便利貼等，總共統計起來大概有 41 類。在材質上也呈現非常多元複雜的性質。材質上包括了有機材質、無機材質，複合材質這 3 大類，紙質類約有 80%，其次是複合材質，將近 10%，第 3 是塑膠類文物。

這批物件進到臺史博所面臨的挑戰，葉前錦分 3 個面向來談，首先是藏品資料的轉換，中研院的文物典藏系統主要的建置目的是資料的公開，所以當初物件登錄的方式是單一物件著錄一筆資料，比較是平行式的登陸編碼。描述欄位總共有 45 個，不做任何的詮釋呈現，較之臺史博的文典系統，中研院的系統是比較單純的，是展示型的資料。而就臺史博的文典系統來說，主要目的是典藏管理，此系統的功能是為了要作為文物的使用、申請、授權等用途，是比較物件導向的。登錄方式雖然也是一物一號，但比較是階層式的登錄編碼，強調物件的主從關係。描述欄位的部分，臺史博的描述欄位是比較少的，因為藏品類型太多樣，包括圖書文獻、器物類、多媒體等，所以當初設計時，採取較彈性的作法，因此只有 15 個欄位。臺史博著錄方式比較偏向文字描述，除了文物外觀描述，也會加入文物的歷史背景或重要說明，所以這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結構的資料庫。為了讓原先建置的原始詮釋資料不要因此喪失，中研院與臺史博進行多次討論，針對兩個系統的 mapping、整併、批次匯入等功能進行嘗試與修正。

其次是入藏原則的篩選，主要是面臨特殊物件，例如太陽餅、乾燥太陽花等。因為是有機材質糕餅、植物，若發霉、變質，會引起庫房內的蟲害問題。再者，乾燥花運至臺史博開箱時，已呈現解體分離狀，但這兩個物件對 318 公

民運動本身都有象徵性的意義，而太陽餅其實是 3 件 1 組的藝術創作，另兩件為藍白拖和香蕉，此類物件的是否保存、如何保存，也與中研院進行討論。目前太陽餅以絕氧包裝進行保存，乾燥太陽花則因解體狀況嚴重，將保存其標籤，但不以藏品身分登錄。這類的物件也可以考量用已拍攝的數位化圖檔，作為修復的參考，甚至仿製。

第三是面臨保存文物的問題，博物館在處理入藏物件從檢視、清潔、登錄等都有標準程序，這是永久典藏的考量，因此以 318 公民運動這批文件的數量，每個小物件都得上這樣的流程下處理，7,000 多件的整理對博物館是很大的負擔。或許可以考慮在典藏策略上參考歐美博物館，定期檢視，必要時採註銷政策，也可以考量在入藏的時候先做一個分級的調整，將當代物件先列為參考品或臨時性的蒐藏，允許保留若干年的觀察期，或是審閱期。等這個 5 到 10 年後，重新再來做一個評估，來看這個物件是否真的有代表性，再來入藏，或許這是一個未來可以考量的漸進方式。

曾婉琳分享的〈活在當下的歷史博物：觀看並省思 VR 再現歷史的『虛擬』跟『實境』〉，是為柯旗化先生 2 次入獄總共 17 年失去自由的故事，並將其故居第一出版社作為場景製作「白色的記憶——夢遊烏托邦」VR 虛擬實境體驗。此案例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與樹德科技大學合作，以真人演出配合 VR 虛擬實境體驗，讓觀眾親身體驗白色恐怖的氛圍、親情的羈絆等情境。曾婉琳以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的媒體觀來省思人在媒體世界中的樣態，並引用博物館學家 Eilean Hooper-Grenhill 的溝通模式，Eilean 覺得早期博物館是單向的溝通模式，而在當代，所謂的意義，將是博物館和觀眾所共同創造。因此，VR 這媒體似乎正如麥克魯漢所言讓我們成為完整的人，而歷史事件的意義，也透過 VR 的體驗，由博物館和觀眾共同來完成。

然而，也正如 ICOM 的副總裁 Alberto Garlandini 所提醒：「科技是方法，不是目的。博物館是資訊的提供者，他們應該控制科技，而不是讓科技決定他們」（Technology is a means, not an end. Museums are information providers. They shall control technology, not let technology decide for them.）。

這場次的會後討論，祝平次老師提出或許可以用 3D 掃描的方式來補足當代典藏特殊物件的保存問題，葉前錦回覆臺史博已經在實驗 3D 掃描進行文物細節的影像建置，未來或許可以應用在修復、仿製等工作。

廖泫銘老師則問到什麼樣的公民運動物件會被臺史博收藏？當代典藏所謂的重大事件是什麼？曾婉琳回應，以博物館來講，當代典藏是一個行動，至於它可以行動的範圍，或是可能會跟每個事件做什麼樣的連結，臺史博都還在摸索和學習，但最重要的是，博物館一定要保有這樣的行動力。當今天社會發出相關需求的聲音，臺史博盡可能有這樣一個團隊能即時到現場，盡力去承載這樣的歷史經驗。

最後的綜合討論中，王長華館長⁷說到文化部正在推動「公共典藏網」，即是在過去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的基礎上，盡力促進公眾化。因為之前的數位化資源仍有許多詮釋資料的缺漏，同時，權利盤點也是這波國家級數位典藏政策的重點。

廖泫銘老師則提到在處理大量文獻數位化，臺灣其實是全球重要的掃描器製造商，有沒有機會讓圖書館、博物館等與廠商合作共同開發出針對古籍或適合特殊藏品掃描的機器，這可能會創造硬體或軟體開發上的價值。

祝平次老師提到，身為公民，或是從大眾史學的部份來看，將來政府可能運用數位世界或大數據控制我們，正如現在臉書、Google 一樣，如果我們對這些東西都不了解的話，是很危險的，就民主發展而言十分不利。所以我們身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每個人都應該理解數位工具，才能夠想出好的對應的方式，不然便很容易就被政府吞噬。⁸

最後，張隆志老師提到作為一個公民，或關心數位發展的人，我們必須去監督、注意的是政府有沒有把事情做好？不管是博物館、歷史學或資訊領域的研究人員，每個人也應各司其職、一同努力，並且試著與國際正在蓬勃發展

⁷ 現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⁸ 2019 年整併該觀察紀錄文章時，正值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祝老師這段話今日來看，心有戚戚焉。

的各式新工具或概念計畫連結，讓臺灣特色慢慢呈現，而這就是我們所希冀的「後數位典藏時期」⁹的到來。期望未來大家不管面對如何的新挑戰，都能在數位技術與歷史研究上一起努力。

⁹ 張隆志老師提到的「後數位典藏時期」約從 2015 年左右開始。



2018年5月5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未來歷史學：當代典藏與數位世界論壇」現場滿座的狀況，臺上講者為第1場次的陳正然先生，講題為〈網路與婉君們：從蕃薯藤到痞客邦〉。



論壇結束後，主辦單位臺史博相關工作人員、與會的講者以及現場學員一起合照。